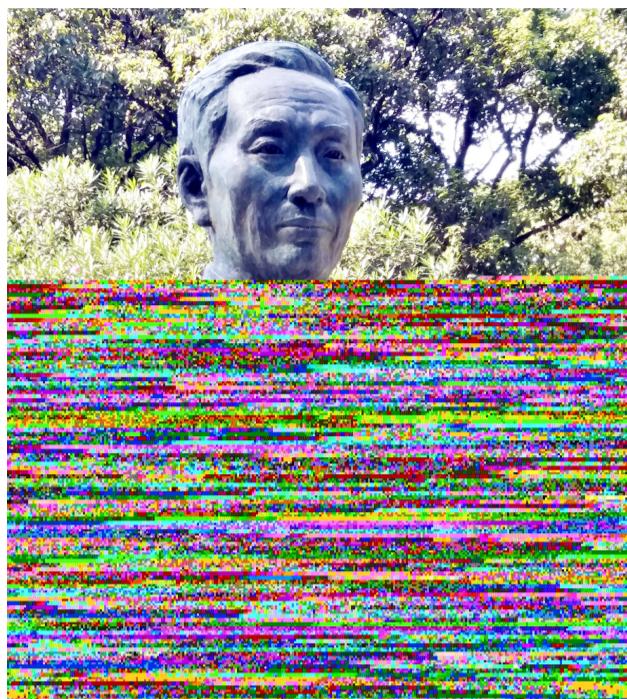




陈望道:为复旦学科建设和学校发展作出贡献



▲复旦校园里的老校长陈望道塑像

陈望道在1920年至1977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除了曾在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安徽大学、广西桂林师专、广西大学以及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工作之外,在复旦大学整整工作了48年,陈望道为复旦大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校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重学科建设, 倾力打造中文系和新闻系

1920年9月,陈望道进复旦大学国文部任教,先后开设了文法、修辞、美学、因明学课程,同时主持国文部附设的《新闻学讲座》课程。1927年陈望道任中国文学科主任后,把原有的新闻学讲座扩充为新闻学组。因为有了这个基础,1929年复旦调整系科时,中国文学科才有可能分成为中国文学系和新闻学系两个系。此后,陈望道任中国文学系主任。

在近十年的文学系教学生涯中,陈望道把开设的文法、美学和因明学课程讲义加以整理提高后,在1922年和1927年先后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论述作文法的专著《作文法讲义》和我国最早探究形式美的论著《美学概论》,在1930年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作的因明学论著《因明学》。

1931年,陈望道为了保护一位左派学生不得不离开复旦,并于1940年秋回到重庆复旦大学。1941年起出任重庆复旦大学新闻系代理系主任,提出“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办系纲领,次年为新闻系系主任后又提出了“好学力行”的系铭,并亲自发起募捐筹建了“新闻馆”。在陈望道的主持下,新闻系办得蒸蒸日上,名闻全国。1941年,报考新闻系的学生为32人,仅占了那一年报考复旦大学学生数的6.4%;而办学4年后的1945年,报考新闻系的学生猛增为479人,竟占了那一年报考复旦大学学生数的22.4%。

1946年抗战胜利后陈望道随复旦迁校回到上海,继任新闻系主任。1950年后,他因校务繁忙不再担任新闻系主任一职,但对新闻系的关注备增。院系调整中,上海市高教局曾以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要停办复旦新闻系,陈望道知道后两次专程上北京,先找到教育部,后又去找周恩来总理。总理请示毛泽东主席后,毛泽东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这样复旦新闻系才得以保留下来。所以,陈望道被视为复旦新闻系的实际创始人。

在1952年陈望道担任复旦校长以后,1955年12月经他提议复旦大学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成立。这是全国高校中最早成立的一个语言研究中心,由陈望道亲自主持。著名教授郭绍虞、吴文祺、周有光、倪海曙、濮之珍、李振麟、胡裕树、蔡葵等都曾受聘于研究室,邓明以、程美英、杜高印、范晓、宗廷虎、李金苓、陈光磊、李熙宗等教授也都先后是研究室的成员。这个研究室就是今天复旦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的前身,陈望道为复旦的语法、修辞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接管旧复旦, 整顿和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在上海市军管会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全面主持校委会工作期间,陈望道为接管旧复旦作出了贡献。

1949年9月陈望道在对旧复旦实行接管后,为整顿和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实行了多项教学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

在行政管理上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在解放前夕因受国民党当局迫害而离校师生返校复职和复学。二是在1950年进行了第一次院系调整,并续聘和新聘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教授学者,如:冯雪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诞辰130周年。日前,复旦大学退休教授、陈望道之子陈振新撰文,从五个方面回顾陈望道为复旦学科建设和学校发展作出的贡献。本期校报节选刊登该文以飨读者。

峰、唐弢、陆诒、倪海曙、周有光等,接着逐步调整了院、系两级领导班子。三是在校务委员会下专设了政治学习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会和专门的图书委员会,以加强对全校师生政治学习和图书的管理。四是亲笔签署了“历次会议记录用十行纸复印三份,一呈高教处,一呈主任室,一存秘书处”的文书档案建设意见。由于陈望道对档案建设的重视,复旦大学档案室至今还完好保存着全部的文书档案。

在教学管理上,陈望道提出并实行了集体教学制度的办法。也就是说,全校各个系根据现有的学科,建立学科教研组。全校每一位教师,都会被安排在各自相关专业的教研组内进行相关的集体教学活动。

在1949年至1951年陈望道受命接管复旦大学的日子里,他主管着学校的一切行政事务,为接管旧复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受命担任校长, 推动学校崛起、发展和壮大

在毛泽东任命陈望道为复旦校长后,陈望道为复旦的崛起、发展和壮大作出了贡献。

陈望道担任复旦校长以后,就领导层面而言,他的正确而富有前瞻性的决策,对复旦大学在五十年代崛起,继而发展、壮大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旧复旦的教学秩序初步得到恢复以后,面对1952年由十四所大学调整后形成的新复旦,陈望道采取了“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作为一校之长,他主持校务委员会讨论全校性的重大计划、经费预算、学校制度以及奖惩,并通过校长的集体办公予以执行。在校委会上陈望道多次提到“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改革”,他继续推行并强化了1951年开始实行的名为“教研组”的集体教学制度。

通过教学改革实现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转固然是首要的,但作为一校之长的陈望道也没有忘记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他说:“高等学校的发展一般有三个阶段,

一是办校务的阶段,二是教务的阶段,三是科学研究阶段。如果一所学校只停留在办校务和教务的阶段,不进一步向科学研究院阶段发展,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肯定不能提高。”正是在这样一个办校方针、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复旦大学从1954年开始,在每年校庆的同时举行科学报告

讨论会。陈望道曾专门为1954年复旦大学科学报告讨论会题词:“综合大学应当广泛地经常地,结合教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祖国建设服务。”在陈望道提出这一办校方针两年后的1956年,教育部向全国各高校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通知,明确高校也要结合教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所以,陈望道的办校方针,在那个年代是极具前瞻性的。

从1952年至1959年,在陈望道主持下的复旦,在上述正确决策的指引下,通过陈望道务实而专业的领导和全校师生员工的努力,1959年5月17日,复旦一跃成为全国十六所重点大学之一。

对于一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全国重点大学来说,陈望道认为,开展经常化的科学研究工作,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这里还有一个学风和校风的建设问题。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和行政办公会议,在1961年、1962年和1963年的三年时间里,曾先后多次讨论学风和校风建设问题。尤其是1963年3月26日,陈望道主持召开了一次在复旦校史上堪称空前(全体教职工、研究生和行政负责人员参加)、专门讨论学风的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两个月后,陈望道又在五十八周年校庆科学报告会上,对培养学风的问题作了全面的补充。在陈望道倡导科学的研究和新学风发展复旦理念的影响下,复旦方方面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跻身国内名校前五位。

为了复旦的发展和壮大,陈望道在作出上述决策同时,还以人为本、身体力行。关于校名“复旦大学”四个字,开始采用的是毛泽东写给周谷城信封上的字迹,陈望道认为还是请毛泽东亲自为复旦题写校名为好,为此,他在去北京开会时专门找了人让毛泽东亲自为复旦题写校名,现在所用“复旦大学”四字即为后来毛泽东亲自为复旦题写的校名。

身为一校之长的陈望道,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复旦员工生活的实际困难,提出了将复旦划归市区的要求。对于有近一万名师生员工的复旦,市政府觉得十分为难,但陈望道还是不断反映。直至弥留之际,市有关领导来医院探望,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再次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是想为复旦说句话,请一定解决好把复旦划归市区的问题。”在他去世后不久,这一问题终于得

到解决。

关心校园规划, 拿出个人稿费资助校门建设

为了建造邯郸路220号校门,预算要2万余元,学校却只有1万元的投入,为此陈望道拿出了自己积攒的稿费1万多元。因为这个原因,在1991年陈望道诞辰100周年时,曾有知情的教师建议将现在的复旦校门命名为望道门,以为纪念。

面对校园内整修马路的扩建规划,陈望道认为校园内的道路开筑,应该有工作区和非工作区的区别。工作区的道路宜筑成笔直的,这样不但方便本校教职员上下班,又不会使外单位来联系工作的同志找不到地方。至于那些非工作区的道路,可以运用美学知识设计得曲折一些。如今成型的复旦邯郸路校区,就是根据陈望道当年提出的方案实施的。

根据陈望道“非工作区的道路可以设计得曲折一些”,复旦的燕园有山、有水、有草、有树、有桥,虽然地方不大,其布局却有一种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感觉。复旦师生都喜欢来到这里休息、看书或思考一些问题,老复旦人都爱称这一景点为“小桥流水”。

涉及多个领域, 广泛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

作为一位著名学者,陈望道在其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涉猎了哲学、文学、语言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因明学、美学等十几个领域,是一位少有的学术多面手。

陈望道的学术研究具有超前的意识,早在1918年留学日本期间就在《学艺》杂志上发表了《标点之革新》等提倡新式标点的文章。

对语言学的研究,是陈望道一生学术研究的重点。除了重点研究语言学,出版了《作文法讲义》《修辞学发凡》和《文法简论》外,陈望道对美学、因明学、伦理学等也很有研究,《美学概论》和《因明学》于1927年、1931年相继出版。

除了上述五部著作,陈望道还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艺术简论》《实证美学的基础》《社会科学原理》等多部译著,近100万字。

在复旦半个世纪,陈望道除出版译著21部外,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译文、论文500余篇,总计留下了400多万的文字。

文 / 陈振新 摄 / 黄文发